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

Globalization Studies: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doi:10.30390/ISC.200008_39(8).0005

問題與研究, 39(8), 2000

Issues & Studies, 39(8), 2000

作者/Author : 洪朝輝(Zhao-Hui Hong)

頁數/Page : 73-8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0/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8_39\(8\).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008_39(8).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

洪朝輝

(美國沙凡那州立大學經濟史教授)

摘要

全球化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的新熱點。文章首先根據發表在海外的有關全球化的英文論著，歸納了主流學術界所流行的有關全球化定義、作用和功能的四大學派，包括新左派、新自由派、轉型學派和懷疑學派。同時，文章對此四大學派進行了批判性的評述和比較，最後提出研究全球化問題所應遵循的四大原則，即定性研究原則、定量研究原則、學科交叉原則和價值中立原則。

關鍵詞：全球化、新左派、新自由派、轉型學派、懷疑學派

* * *

近年來，全球化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學術研究的跨世紀顯學。自一九九九年以來，華人學術界圍繞著全球化問題，也出現了可喜的爭鳴局面。為了幫助華人學者及時跟蹤英語世界的研究前沿，避免低水平的重複研究，本文試圖對近年來的世界全球化研究作一簡單的歸納和述評。

壹、新左派：全球化等於新帝國主義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首先出現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法國和美國。到一九七〇年代，「全球化」已成為全世界各國的通用之詞。^①但至今有關它的精確定義和具體影響，仍然是見仁見智。大致而言，目前英文學術界圍繞著全球化的定義、作用和功能出現了四大學派。

首先是新馬克思主義派或新左派 (Neo-Marxists and Neo-Left)。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S. Amin, A. Callinicos 和 S. Gill。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將全球化等同於帝國主義化、西化和中世紀主義。他們認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了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

註① G. Modelska, *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和資本主義的勝利，^②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兩極分化，而國家和政府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理人」。^③

尤其是，新左派認為，目前的「政治全球化」是企圖恢復古代的帝國系統，模糊國家和領土的概念，由一種文化和宗教（如羅馬天主教）、或一種政治制度（如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來統治一大區域，甚至全球國家。新左派認為，自古代以來，世界歷史在帝國與反帝國，或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較量中，經歷了五大歷史時期。第一是發生在西元五〇〇～一五〇〇年期間的中世紀，可稱第一次帝國時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時期，它以神聖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為代表；第二是發生在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期間的反帝國時期，也稱近代民族國家時代（Nation-State），它以歐洲國家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為標誌；第三是第二次帝國時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時代（一八〇〇～一九四五年），以大英帝國和拿破崙帝國為代表，以地緣政治（geopolitics）為特徵；第四是戰後的一九四五～一九七〇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國、反全球化時期，以民族獨立（decolonization）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特徵；第五則是發生在世紀之交（一九八〇～二十一世紀初）的第三次帝國時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時期，以歐盟（EU）、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北美金融貿易組織（NAFTA）為代表，以非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重新一統化（re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地緣經濟（geo-economy）為特徵和趨勢。^④

對此，新左派認為，當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孕育了新興的歐洲民族國家之後，帝國系統在歐洲開始瓦解。但自主之後的歐洲列強將這種帝國遺產移植到拉美、亞洲和非洲，直至二戰之後，亞非拉國家開始回歸當初的獨立國家形態。如今，世紀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種形態的帝國體制，所不同的是，這次全球化不是以軍事強制為先導，而是以市場和資本為杠杆，沒有鮮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場規律之上的自願原則。如果當初是通過戰爭打破主權界線和領土觀念的話，那麼今日全球化則是通過資本、資訊和市場來衝擊國家主權，促使國家和領土的界線再度淡化。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規律的迴圈效應。另外，與十九世紀的武力侵略、領土霸佔所不同的是，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奪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領土。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丟棄市場比丟棄領土更為悲慘，因為丟掉領土（如中國丟了香港）仍然可以再奪回來，領土是看得見的實體存在，但丟了市場，就一去不復返了。而且，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種「資訊殖民主義」，WTO是市場帝國主義，IMF是金融帝國主義，聯合國則是一種政治外交帝國主義，全體發展中國家再度成為西方帝國主義「臣民」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所以，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西方帝國主義、西方現代化、西方資本主義和西

註②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94).

註③ 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Press, 1997), pp. 30~44;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94); S. Gill, "Globalization, Market Civi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Vol. 24 (March 1995), pp. 399~423.

註④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3~137.

方體制的全球性擴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化普及。^⑤

另外，新左派批判這次全球化是一種「新中世紀主義」（New Medievalism）的復興。中世紀主義的本質是所有天主教國民不受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每個國家必須在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絕對權威下，分享主權，其核心是表明國家主權是可以重疊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overlapping authority and multiple loyalties），^⑥演變到世紀之交的話語，即是「人權高於主權」。而且，新左派強調，古代的帝王（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中國的皇帝）往往只是統治（ruled）整個帝國，但並不管理（governed）帝國的所有領地和番邦，他們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資源、組織體系和資訊渠道去管理所擁有的龐大疆土，也就是說它們注重「面子」，不重「裡子」。但當代政治全球化的趨勢是，強大的跨國公司和西方資本注重的是「管理」傳統的民族國家，而不是「統治」它們的主權，要的是「裡子」，而不是「面子」。^⑦所以，「新帝國」比之於「舊帝國」更具欺騙性和危害性。

很顯然，新左派的研究存在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情緒色彩，使用了大量的概念性用語，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中世紀主義」和「民族主義」等，並使用簡單的歷史類比，刻意強調今日全球化與昨日帝國主義的相似性，而忽略了兩者的不同性。殊不知，儘管歷史會出現重複，但更會產生「揚棄」效應，即更高一個層次的發展，而不是簡單的回歸與複製。例如，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開放」與鄧小平時代中國大陸的開放，就不是同一性質上的門戶開放，前者是被迫的，後者是自願的；前者是喪權辱國的，後者是深得民心的；而且，前者的後果是積弱積弊，後者是強國富民。所以，不能簡單地將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也歸類為新帝國主義或新中世紀主義。

另外，新左派將失去領土與失去市場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如果說，失去的領土可以隨著國力的增長而奪回來，市場照樣可以隨著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從無到有，由小變大，並且吐故納新。尤其是，領土是相對固定和靜止的，是一個「你得我失」的零和關係，而市場的「大餅」是可以不斷做大的，「你得」不一定是建立在「我失」的基礎之上，而是存在「雙贏」的可能。所以，運用固定不變的「反帝國」思維，難以解釋不斷變動的全球化現象。對此，新自由派就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

貳、新自由派：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象徵

第二大學派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K. Ohmae 和 W.

註⑤ S. Am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May 1996), pp. 77~89; L. Benton, "From the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to Institutional World History: Culture and Economy in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7 (February 1996), pp. 261~295.

註⑥ H.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254.

註⑦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p. 33~34.

Grieder。他們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不一定是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尤其是，他們認為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先驅，因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場和全球競爭一體化的出現。^⑧

新自由派通過大量的世界貿易變化的定量研究，強調貿易全球化的結果是「雙贏」。例如，從貿易結構而言，一九六五到一九九五年期間，儘管發達國家間的貿易量仍占全球貿易總量的優勢，但已從 59% 減少到 47%，同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則從 32.5% 增加到 37.7%，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則從 3.8% 猛增到 14.1%。^⑨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品出口大幅增長，在一九六三～一九九五年期間，發展中國家（除中國外）的工業品出口比例占全球工業品出口的比例，從 6% 猛增到 20%。^⑩

而且，新自由派大力讚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積極功能，認為它確定了國際貿易的四項革命性、普遍性原則。一是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ion），由此恢復了大蕭條危機前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二是互惠性和對等性（reciprocity），所有成員國享受對等的關稅待遇；三是透明性（transparency），防止黑箱作業；四是公平性（fairness），旨在反對低於市場價格的傾銷政策。由此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國際關稅大幅下降，同時減少了在服務業方面的貿易障礙。據估計，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按人口計，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到了九〇年代，其比例已上升到 50% 以上，如果中國一旦加入 WTO，那麼這一比例將上升到 80% 以上。^⑪

同時，在超國界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組織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已對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產生巨大影響。為了因應經濟全球化的壓力，目前一些國家和政府被迫削減國家支出和政府干預。這樣，經濟全球化已經形成一種「鐵籠」（iron cage）效應，迫使每個政府嚴格遵守全球金融的共同規則，促使現行的福利政策受到大幅度削減，政府的獨立功能大大萎縮。^⑫

新自由派還強調，資訊不可能是獨佔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 Internet 上的資訊是極為公平的，任何國家和民眾在此都能得到同一種價格的資訊、同一個商品交易會

註⑧ K.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K.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W.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7).

註⑨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65～1995) (Washington, D.C., 1965～1995).

註⑩ GATT/WTO, *International Trade Yearbook* (Washington, D.C., 1963～1995).

註⑪ J. Sachs and A.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ay 1995), pp. 1～95.

註⑫ R. Cox,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A. G. McGrew,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49～72.

的時間，所以全球化下的資訊流動是跨國界、無階級的。尤其是，根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國家，都將被開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國大清帝國的命運，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歷史是無情的，拒絕現代文明，必然被歷史所淘汰。如今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贊同與否，人類的選擇只能是接受、適應和參與。而且全球化與西化不同，因為全球化導致全體地球的公民受益。^⑬

有意思的是，儘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對全球化的價值評斷截然相反，但兩派卻一致認同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和必然趨勢，所以，兩派也可合稱為超全球化學派（the hyperglobalist thesis）。^⑭他們一致承認全球化的重大意義，認為全球化不僅已經成為事實，而且全球化已經提出從根本上重建「人類行為架構」的要求。^⑮尤其是他們共同認為，經濟全球化正在導致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趨勢，傳統民族國家（the nation-state）的權威和地位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之下，傳統的國家既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內部事務，也不能滿足本國國民的跨國界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下的傳統民族國家，已經成為不自然、甚至不可能的經濟實體」，經濟全球化正通過建立生產、貿易和金融的跨國家體系，推動「經濟的非國家化」。^⑯

在此沒有國界的經濟體系之下，每個國家政府的功能已經弱化為全球資本的「傳送帶」（transmission）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個「三明治」的功能，成為介於強大的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之間的「媒介機構」。這樣，「客觀的世界市場正在比國家的力量更強大」，^⑰國家的主權和政治的權威最終將聽命於全球化下的經濟力量，經濟全球化最終將形成一個超然於國家主權的社會經濟組織，取代傳統的民族國家，並成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主體。

總之，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認定國家主權將讓位於經濟全球化，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勞動控制資本」前提下的國家消亡，實現無產階級主導世界的共產主義理想，並對如今急速發展的全球化深表憂慮和悲觀。相反，新自由派懷著興奮和樂觀的心情，讚美目前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控制勞動」下的國家權力弱化。

其實，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間的論戰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可以歸納為「動機VS.後果」、「道德評價VS.經濟評價」、以及「短期效應VS.長期效應」這三大不同的角度。首先，以「動機－後果」的關係而言，新左派習慣強調強權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自私動機，因此自然否定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所謂「援助」，因為

註⑬ Anthony Gidder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註⑭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 2.

註⑮ M. Albrow,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 85.

註⑯ K.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5.

註⑰ S.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

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動機是無私的，他們必定是以營利、剝削、甚至摧殘為最高原則。而新自由派則樂於關注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投資的後果，儘管其投資的動機是自私的，但資本投資或全球化的後果往往是正面大於負面，英國殖民香港的經濟後果就是一個正面的例子。

其次，從「道德評價－經濟評價」的關係入手，新左派自然側重運用道德評價的方法論，強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手段和方式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並將近代的軍事侵略與目前全球化下的經濟侵略相提並論，全盤否定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任何正面作用。作為對比，新自由派則刻意淡化道德評價，強調經濟評價，即主要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比較發達國家侵略前和侵略後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影響，或者比較全球化前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指數變化，其結論自然是對發達國家的侵略或全球化持正面的肯定態度。

最後，關於「近期效應－長期效應」的關係，新左派喜歡關注全球化的近期效應，其結論就自然是發展中國家失去了市場、人才、資源，最終並削弱了國家競爭力，只能任憑發達國家予取予求，非洲國家的落後現狀就是明證。而新自由派則強調全球化的長期效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短期損失只是一種「陣痛」，是必要的「學費」，其長期效應必定是正面大於負面，東亞四小龍的發展歷程就證明了這一點。

如何協調這兩種對立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也許正確的思路是平衡、兼顧和中道。對此，「轉型學派」似乎正在朝此方向做出努力。

叁、轉型學派：全球化推動社會轉型

第三大學派是「轉型學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 J. A. Scholte 和 M. Castells。他們共同認為，身處新世紀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⑩目前的全球化完全是史無前例的，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線已經不再清晰，所謂的「國內外相交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日益成為一種新的領域，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遽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社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⑪所以，對這一學派而言，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產生「遽變」（shake-out）。^⑫

但另方面，「轉型學派」認為，這種世界秩序的遽變又充滿變數，因為全球化在

註^⑩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J. A. Schol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cial Chan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w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註^⑪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註^⑫ Anthony Giddens, "Globalization: A Keynote Address," *UNRISD News*, Vol. 15 (May 1996), pp. 11~22.

根本上是一種偶然的歷史過程，^②而絕不是如新左派和新自由派所認定的歷史趨勢與必然規律，誰都無法預測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構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說，「轉型學派」既不否認全球化的存在與威力，但也不斷定全球化必然導致傳統國家的消亡，而是儘量不對全球化作出價值判斷，既不認同新馬克思學派的全盤否定，也不贊同新自由學派的正面肯定，而是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發生和發展充滿自身的矛盾與各種合力的因素，尤其是當代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可尋的。所以，全球化的內容與方向是無法預知。

儘管「轉型學派」並不認同全球化正在導致民族國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認全球化下的新主權不再是傳統主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零和性」，^③而且認為，「國界」已經日益成為全球化的麻煩製造者，日益面臨著跨國界或無國界國際組織的挑戰。例如，歐盟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混合體，其主權被分割為國際、國家和地方三大塊，任何一方（尤其是國家權力）都難以獨立處理發生在自己領土內的金融和生態等事務，所以全球化是促使主權、領土和國家權力的關係發生轉型，傳統的民族國家不再是世界權力的唯一或主要的統治形式。^④這樣，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他們認為理性、明智的國家政府應該轉化自身的統治功能，變傳統的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側重推動經濟發展、協調集體行為、以及促進國際合作。他們堅持認為，全球化不是促使國家消亡，而是促使國家和政府實行戰略轉型和重組，並導致政府的活動更積極、更重要。^⑤

尤其是，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Anthony Giddens，他是轟動一時的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和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的作者，主張中間偏左（centre-left）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由此為「轉型學派」增加了理論厚度。^⑥而且學派爭論的歷史表明，誰越站在「中道」的立場，誰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掌聲，因為中道總是代表大多數。

總之，如果「超全球化派」定義全球化是全人類行為方式的根本性變革的話，那麼「轉型學派」則認為全球化是區域間關係和行為的重組，國家不會因此消亡，也不會因此強大，而是因此得到轉型和重組。^⑦

「轉型學派」似乎力圖將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對立引向調和與中庸，但並沒有明確提出「中道」的方法和途徑。對此，筆者的「三面硬幣理論」也許能夠提供一些啓

^{註②} M.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June 1997), pp. 472~496.

^{註③} D. Held,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97~235.

^{註④} J. G. Ruggie, *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⑤}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⑥}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註⑦}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 10, table I.1.

示。「三面硬幣理論」是指硬幣除了顯而易見的左右兩面外，更重要的是介於左右之間的中間一面，其功能是協調、連結和平衡，^②尤其是硬幣的第三面促使硬幣從平面變成了立體，它表明分析問題不能僅僅局限於左右兩面，而應該從中道、立體的角度，全方位地分析特定的現象與人物。

這一「三面硬幣理論」能夠鼓勵人們從「動機－後果」、「道德－經濟」、「短期－長期」的多重視角，具體分析全球化的結構與功能。也許，人們應該淡化對全球化進行簡單的「好壞、優劣」的價值判斷，而應該強調「有效、無效」的功能判斷，尤其是不能對全球化作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論，應該側重分析具體國家、具體領域和具體時段條件下的全球化效應，避免大而無當的概念性定論。

肆、懷疑派：全球化是無中生有

第四大學派是「懷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簡稱「懷疑派」，其代表人物是 P. Hirst 和 G. Thompson。與上述三大學派不同，「懷疑派」認為甚囂塵上的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和天方夜譚。

首先，懷疑派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紀末的經濟全球化不是什麼新玩意，更不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十九世紀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時期，已經出現過全球經濟、市場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體化。如今的所謂「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而已。^③他們中也有人認為世紀之交的全球經濟，只是一種「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為它只是三大區域的金融和貿易的合作，即歐洲、亞太和北美。^④而且，經濟區域化正在朝著逆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因為區域經濟日益走向排他、封閉和保護。所以，目前的區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動力，而是阻力。^⑤所以，當代流行的所謂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⑥

同時，「懷疑派」通過大量的定量研究認為，「超全球化」學派所認定的國家弱化和消亡的繆論，完全是聳人聽聞、無知可笑，因為這在根本上低估了國家和政府干

註②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In Search of Re-ideologiza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Andrew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36~37.

註③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註④ W. Ruigrok and R. van Tulder,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5); R. Boyer and D.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註⑤ D. Gordon, "The Global Economy: New Edifice or Crumbling Foundations?" *New Left Review*, Vol. 168 (May 1988), pp. 24~64; L. Weiss, *State Capacity: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p. 1~3.

註⑥ P. Hirst, "The Global Economy: Myth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April 1997), pp. 409~425.

預國際經濟的持續性力量。目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只有依靠具體國家和政府的協調和推動，才能達到經濟自由化的持續，不然將一事無成。政府絕不是國際化被動的犧牲者，而是主要的設計師和建築師。例如，今日的國際化，就是美國政府在二戰後所推動的雙邊經濟體系和民族經濟自由化的一大副產品。^⑫經濟國際化並不可能導致國家和政府失去機動性（immobilization），因為資本的國際化「不僅僅能限制政策的選擇，也能擴大（政府政策的）選擇」。^⑬

另外，「懷疑派」認為，國際化並沒有導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而是意味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日益邊緣化，因為貿易和資本更多地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並由此產生更強大的「排弱」效應。^⑭同時，他們根本否定全球化能夠有助於全球勞工的分工與合作，有助於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就業機會的奇談怪論。^⑮因為從經濟結構而言，「懷疑派」認為過去一個世紀的世界經濟，國際化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世界經濟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級結構。所以，所謂的全球化只能導致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立領地，而不是什麼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體化的出現。^⑯

這樣，不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迷思，文化全球化更是一個天方夜談，而這種一統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全球化「迷思」與「狂想」，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臆想和杜撰出來的，所謂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國際一致」（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總是那些自我感覺良好、並企圖強加於別人的一批強權國家的口號。^⑰所以此派學者很不認同「超全球化」的觀點，認為一方面，全球化不可能導致全球經濟政策的一致，^⑱另一方面，則認為全球化不得人心，正在遭到許多國家和民衆的有效抵抗，^⑲發生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美國西雅圖WTO會議期間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表明，不僅發展中國家反對全球化，而且發達國家的勞工團體與環保團體也成

註⑫ R.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⑬ L. Weiss, *State Capacity: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184.

註⑭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p. 1~5.

註⑮ P. Krugman, *Pop Internationalism* (Boston: MIT Press, 1996).

註⑯ Samu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註⑰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Papermac, 1981), p. 87.

註⑱ H. V. Milner and R. O. Keohan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R. O. Keohane and H.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p. 14.

註⑲ M. Geyer and C.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October 1995), pp. 1034~1060; J. A. Frieden and R. Rogowski,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R. O. Keohane and H.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pp. 25~47.

為強有力的反對者。

「懷疑學派」似乎有點標新立異，但研究就是在不斷的懷疑過程中深化的。這一懷疑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並不新鮮，它有可能借鑒了二戰後流行美國學界的「修正學派」，^⑩從歷史心理學的角度強調，許多民衆司空見慣的現象其實都是虛擬和假像，而現實中種種虛擬的「迷思」和衝動往往導致許多歷史的衝突和人類的災難。這樣，全球化所引起的衝突，就像世界大戰和美國內戰一樣是人爲的，絕不是必然的，所以是可以避免的。

很顯然，「懷疑學派」的方法論是唯心的，以此推論，任何存在的現象都是虛擬的和人爲杜撰的，因而就不可能是合理的。筆者以爲，種種客觀的事實表明，全球化不僅存在，而且已成一種大勢，任何人爲的肯定與否定都不能改變全球化存在和發展的事實。

伍、結語

綜上所述，全球化似乎應該定義爲跨區域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的擴展過程，並對地球另一區域的民衆和社區產生廣泛（extensity）、強烈（intensity）和快速（velocity）的影響。^⑪這裡的區域（region）是指具有類似文化、宗教、觀念或經濟特點的一批國家，如歐盟和東協等。^⑫所以，全球化與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存在不同的定義，民族化是指在限定的國界內所進行的社會交流過程；國際化是指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的交往；區域化則是指同類國家在限定區域內的交往；而全球化是指不同區域在不同地域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⑬

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的全球化討論，筆者以爲至少需要遵循四大原則。一是定性研究原則。即爭論各方需要界定全球化的定義，包括全球化與現代化、工業化、國際化和西化等相關名詞的聯繫與區別。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共同的話語和共同的「平臺」，這是起碼的爭論起點。

二是定量研究原則。每當一個術語成爲非學術的流行話語之後，尤其是當官方也普遍介入並使用這一學術術語以後，往往產生濫用和語義不詳的現象。對此，學者有責任導正研究方向，尤其是需要對全球化的廣泛性、強烈性和快速性有一個系統的定

註⑩ E. B. Smith, *The Death of Slavery, The United States, 1837~6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註⑪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p. 15~16.

註⑫ B. Buzan,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 G. McGrew and C.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67~87.

註⑬ T. Nierop, *Systems and Regions in Global Politics: An Empirical Study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rade 1950~1991*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94).

量研究和定義。

三是學科交叉原則。全球化貴在「全」，它不應該也不可能僅僅是經濟或市場的全球化，它只能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包括資訊、教育、文化、政治、軍事和觀念的全球化。所以，各領域的學者需要整合，需要互補，共同推動全球化研究的深化。

四是價值中立（value-free）原則。目前全球化的討論已經出現情緒化、立場化和階級化的傾向，已經出現以國家和區域劃線、以貧富和階級劃線、以政見和價值劃線的負面傾向，其後果必然促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流向政爭和情緒之爭。對此，需要各方努力走向理性、逼近客觀。

可以預見，有關全球化的學術爭論是一個世紀性課題，每個參與期間的學者都在書寫學術歷史，為了促使這場世紀之爭流芳青史，學術界需要呼喚科學、理性、客觀、責任、合作、寬容與良心。

* * *

（收件：89年3月2日，修正：89年5月10日，再修正：89年6月16日，接受：89年8月31日）

Globalization Studies: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Zhaohui Hong

Abstract

Globalization studies has been a popular turn-of-the-century research topic. This article is designed to summarize the definitions, functions, and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as found in the leading scholarship on the subject. After discussing the four schools of globalization studies – Neo-Marxism, Neo-Liberalism, 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 and the Skeptical Thesis, the article critically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ound in these four approaches.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four principles of globalization studies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interdisciplinary, and value-free judgment.

Keywords: Globalization; Neo-Left;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 Skeptical Thesis

